

以文运事 以诗叙心

——读新版《文天祥传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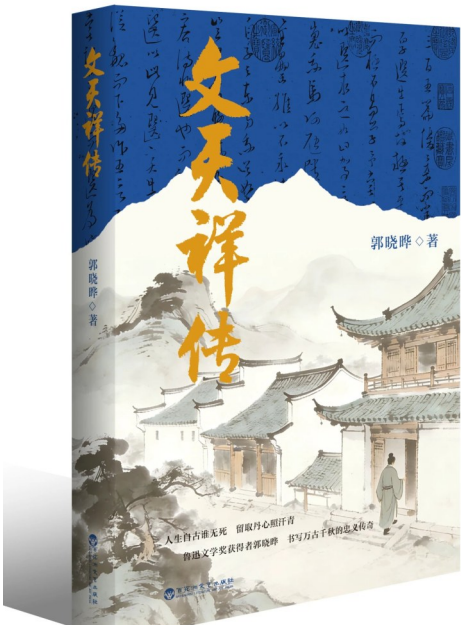
□范咏戈

700多年前，文天祥在元大都土牢被囚禁三年后，忽必烈百般劝降不从终下杀令。带镣长街行的文天祥在柴市刑场就义。读郭晓降所著新版传记文学《文天祥传》，为这部以文运事、以诗叙心的作品所感动，沿坡溯源，获得对这位“千古忠魂第一人”精神价值的再认识。

优秀历史传记文学的第一要素是史真。《文天祥传》足见作者广征史料、多方求证、真实还原历史之功。作品拒绝为博眼球、流量采用野史、虚构与随意嫁接。文天祥从20岁在临安状元及第到47岁在元大都遇难，一生处于南宋大厦将倾和覆灭的乱世。《文天祥传》对南宋末年的历史叙事肇肌分理、清晰准确。从文天祥出生到他参加殿试的二十年间，蒙军不断进犯宋地。灭大理国后准备一举攻占南宋心脏——临安。一方面是国难当头，一方面是理宗、度宗守内虚外，苟且偷安。理、度两皇之后，继位的竟是三个不到10岁的小皇帝，权臣把持朝政，应了古谣“直如弦，道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”，南宋气数将尽的弦已拉满。报国无门的文天祥几次拒绝朝廷任命。但当临安处于危卵之时，他却挺身而出，散尽家产募兵勤王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，遂蒙大难。五里坡战斗中他被内奸出卖，面对突然闯进大帐的蒙军，他把早已准备好的“龙脑香”（毒药）吞下以求自尽，但未能遂愿，昏迷中被俘，在

被押送往元大都的途中又绝食七日，求死未成被押至元大都后，忽必烈许以元丞相高位劝降被他断然拒绝，在七种恶秽之气侵袭的土牢中写下《正气歌》，向南叩拜后走上柴市刑场。《文天祥传》历史叙事的特点在“乱世”与“末世”，以此作为其精神长成的空间。作者依据充分的史料与多方求证，确保了南宋末年蒙军（后称元军）兵临城下、临安陷落、朝廷南逃、崖山决战等历史事件“大事不虚”，堪称可靠的历史档案。历史空间与生命维度同构，文天祥在特殊历史时空空中由“状元宰相”到千古忠魂，用47年的生命写就了一首中华气节史诗，体现出作品对传主的创造性阐述。

面对一位政治家、军事家和文学家兼于一身的“状元中的状元”，面对文天祥习惯于以诗记事述怀，《文天祥传》在平衡历史性和文学性的关系上做得十分出色。作者以诗人情怀共情于文天祥，采取“以诗叙心”的写作策略书写文天祥的“内圣外王”。这是这本传记区别于以往文天祥传的一个亮点。书中对文天祥被俘后拒降、以诗明志留名青史作了浓墨重彩的记述。书中引用的文天祥在不同时期写的几十首诗，宛如叙事里的一条红线，勾勒出了文天祥的豪气与忠魂。在被俘的船上，他感慨国家的命运，以决绝的意志挥泪写下《过零丁洋》，“辛苦遭逢起一经，干



《文天祥传》，郭晓降著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2026年4月

戈寥落四周星。山河破碎风飘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千古名篇。在元大都兵马司土牢里，文天祥创作《正气歌》，编撰《集杜诗》

200首，以杜甫诗句重构南宋史诗，写下《纪年录》，把牢狱变成历史审判庭。书中特别写到文天祥第一次被俘逃脱到京口后，想到又可以重新组织队伍抗元，心情万分激动，船过扬子江口时写下《扬子江》：“几日随风北海游，回从扬子大江头，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”此诗与他的诗集《指南录》《指南后录》都取意于不忘南宋故国。直到最后上刑场，他早已拟好刑场七律二首，“惟有一腔忠烈气，碧空常共暮云愁”，在浩然诗氛中南面而坐，从容就义。忽必烈最终也叹服“谁家无忠臣？”

历史的星空中总有一些灵魂不灭，跨越千年依然照亮民族精神的长河。文天祥这位南宋末年的状元宰相，以血为墨，以笔为剑，用一生践行了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”的誓言，让“正气”二字成为华夏文明最坚硬的底色。他的“正气”，是面对诱惑时的坚守，是国难当头时的担当，是生死抉择时的从容。民族精神的血脉是跨时空的。叶剑英元帅称赞方志敏烈士的诗中写“文山去后南朝月，又照秦淮一叶帆”，将方志敏与文天祥并列。我前不久去府学胡同因据禁文天祥土牢修建的文丞相祠，见一位20多岁姑娘在文天祥像前跪拜，想英雄身后不寂寞，心生暖意。也许这正是《文天祥传》修订重版的意义。

（作者系文艺评论家）

田野之间的地方诗学

——评《江苏当代诗歌论纲》

□陈琼琚 黄德志

完成了对地域诗学内涵的系统性重构。江苏跨江滨海、水网密布，南北地域文化的差异，天然塑造了诗歌气质的多样性。该书没有将“江南性”视为静态的地域标签，而是清晰呈现出其多元共生的特质：苏南的吴文化传统滋养了温润雅致的抒情脉络，苏北的楚汉风骨孕育了雄浑厚重的写作路径，从徐州的“新大风歌”到连云港的“山海情歌”，共同构成了江苏诗歌丰富的美学光谱。与此同时，书中对“他们”诗群与第三代诗人的专章梳理，更清晰呈现了江苏诗歌的先锋面向——它并非古典传统的单向延续，而是始终参与着中国当代诗歌的前沿探索，在语言革命与叙事革新中留下了深刻印记。

水系书写的专题研究，是该书在地域诗学领域的开拓性贡献。书中专门设立章节讨论大运河与里下河主题诗歌，将自然地理的水系网络转化为诗学研究的核心脉络，论证了水文化如何塑造江苏诗歌的流动性、包容性与抒情底色。这种以核心意象为切口的写法，跳出了空泛谈论“文化熏陶”的老路子，让地域特色的论述牢牢扎根在具体文本里，也为区域诗歌研究的方法更新留下了切实的参照。

尤为难得的是该书的包容性视野。书中纳入了行业书写、“基层”书写、“身体障碍”书写与少儿诗歌等多重维度，将不同身份、不同圈层的写作者纳入研究版图。这正是作者治学立场的直接体现：不预设流派高下，不固守审美偏见，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一地诗歌的生态全貌。

该著中篇“地方写作的多种可能性”深入肌理，完成了对江苏省诗歌生态的精细化普查，是全书最具学术补白意义的板块。

长期以来，区域文学研究多存在“重省会、轻地市；重名家、轻民间”的惯性，地级市尺度的诗歌生态梳理往往被学术界忽视。该著首次实现了江苏十三市诗歌生态的全覆盖：从南京的学者诗人群落到无锡的“三月三诗会”，从南通的女诗人群体到扬州的“虹桥书院诗群”，从太仓的“长江口诗歌部落”到常熟的一城诗群部落”，不仅清晰梳理了各地的代际传承脉络，更关注到民间诗歌社团、地方品牌诗会的活态运转。这些散落在各地的民间诗群与诗会，共同构建了自足的在地文学场域，让诗歌脱离了单纯的纸面传播，成为一种可参与、可传承的文化生活方式。作者更进一步将研究触角延伸至县域层面，正面提出“县城写作”这一命题，打捞了一批“小地方的大诗人”。正是依托四千多公里的全省走访与一手访谈素材，这些基层写作者才得以进入研究视野，也让这部诗歌史摆脱了纯书斋写作的悬浮感。

该著下篇“江苏诗人的风格化书写”集中体现了全书的研究深度。22位代表性诗人的专论，构成了整部著作的核心支点，充分彰显了作者诗人与学者双重身份的独特优势。作者为每位入选诗人撰写的专章，都是完整梳理其创作脉络、提炼其诗学内核的“诗传式”研究：从韩东“诗到语言为止”到“亲切叙事”的诗学转向，到小海以40年时间搭建起的诗歌理想国；从丁可扎根乡土的“低处”书写，到胡弦以细节洞察世界的静观诗学；从黑陶的文化记忆诗学，到姜桦的滩涂歌者……每一篇都兼具风格定位的准确性与脉络梳理的完整性，达到了单篇作家论的学术精度。这份研究的代表性，来自作者公允的遴选尺度：既以文本质量

与诗坛影响力为核心依据，兼顾专业奖项的参照，同时充分考虑区域分布、代际梯度与性别结构，上至百岁诗人沙白，下至青年新锐，覆盖全部十三设区市，真正践行了“不厚大地方的小诗人，不薄小地方的大诗人”的治学原则。

作为新时期以来江苏诗歌的“同路人”，作者的亲历者身份为研究注入了独特的温度，以“了解之同情”的视角进入文本，精准捕捉诗人的写作心境与风格内核，避免了纯学者研究常有的“理论套文本”的僵硬隔膜。同时，严谨的学术训练又让研究始终保持着客观的史识判断，没有陷入纯诗人写史常有的个人趣味偏好与门户之见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全书由作者“一支笔写到底”，既保证了审美尺度与史论逻辑的前后统一，也让各部分内容彼此呼应、浑然一体，始终保持着一致的治学分寸。

百年新诗的版图，从来不是靠几座高峰连缀而成，它有赖于一片片具体地域的扎实隆起。《江苏当代诗歌论纲》做的正是这样一项地基性的工作。它以包容的眼光、实地的考察，把地方写作的活力与价值摆到了文学史的视野中央。地方经验越清晰，整体的诗歌图景就越厚重。当更多散落的基层写作被认真打捞，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才会更完整、更有分量。对江苏诗歌而言，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诗学总结；对整个区域诗学研究而言，它也开出了一条值得接续的探索之路。对此，吴思敬教授对该著的评价非常准确：“无论是对江苏省域文学的研究，还是对中国当代诗歌史的建构，均有重要意义。”

（陈琼琚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，黄德志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《人来人往》（《香港文学》2026年7月号）是旅港作家赵阳的散文新作，通过“驻足”与“思考”的叙事姿态，完成了对“我城”的空间解读；经由一连串“相遇”与“失语”的场景，展现了新港人在身份认同上的新变化新特点。特别是文中对粤语的精准运用以及与“南来”前辈的互文，揭示了作者在文化传承与自我定位上的自觉意识，《人来人往》体现了新时期香港作家有关“文化寻根”的创作思考。

作为新时期“南来作家”的代表之一，赵阳近年来专注于“香港散文”创作，出版了《香港记趣》等5部“香江系列”散文集，为香港和内地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文学桥梁。地铁是赵阳“香港散文”创作的重要元素。《人来人往》第一则故事作为全文的基调与总纲，场景设定在港铁上环站的月台——一个典型的过渡性空间，象征香港永不停歇的生活节奏。然而叙事者的行为却与此格格不入：他“数”地砖，在“第九十九块”前驻足良久。以此行为建构出三重对抗：以“慢”对抗“快”，以“驻足”对抗“川流”，以“思考”对抗“麻木”。当月台上满是“嗒嗒哒哒”的声响”与“呼啸而来的列车”时，“我”却以近乎仪式化的步伐，一级一级走下，一格一格数过，从被城市裹挟的“人流”中抽离出来，获得了观察者的视角。作者刻意描写月台两端如同山水画的留白，是被人遗忘的角落，而“我”偏偏走向那“鲜有人迹”的尽头，将自己安置于边缘。“四十八、四十九……”月台中段的出口标识牌上写满写字楼的名字，而“林士街停车场”卑微地挤在中间，浓缩成一个小点。“这一站，本应该是叫‘林士街’的，倘若不是东九龙过海铁路和西港岛线规划的一变再变”——叙事者不仅观看，更在想象：看着大理石上的泼墨山水暗纹，联想到城市规划的变迁，这种对空间历史层积的思索，是对“当下即用”的消费主义城市逻辑的抵制。他写道：“每一次转过身时，我都像与这个城市在一个小小圆点上，完成了一次时空的交汇。”月台由此成为城市的时间河流，时刻提醒我们“活着的证据”。由此确立了全篇的叙事姿态——在人来人往的表象之下，寻找城市被遗忘的肌理；而推动这一“寻找”的，是一名作家自觉担当的使命和责任：立足香港，思索、关注并推动中华文化与人文精神在新时期香港厚植根基、落地生根。

赵阳的散文注重捕捉香江的人文之美和人性幽微。《人来人往》中讲到了一个家世贫寒的年轻人与“我”的邂逅，以及猝然留下的美好与遗憾。作者大量使用广东话对白。这不仅是为了真实再现场景，更是一种深具文化意义的叙事策略。当一位从内地来港的作家能够自如地让笔下人物说出“点？”“唔紧要”“好妣，通顶”时，这本身就是对在地文化的深度接纳。广东话承载了超越信息传递的情感重量。当故事主人公用粤语说出“你关心我，我真系好想喊”时，语言成了一种建立情感连结的桥梁。正是语言的“在地”特质，让“我”的关心显得并非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平等的同侪慰藉。“那个清晨，我讲过什么？只有两个字吧，而且还那么怯生生的。倘若，我那天就匆匆地错过，或许此生也没机会听到他的故事。而此刻，我很想抱抱他。”然而故事以遗憾收场，“我”终究没有说出那句“这世界，你并不孤独”，也“终究没有抱到他”。这里的“失语”令人感到作者内心的深沉和人文观照，也深化了作者对城市生存本质的思考。

赵阳的香港题材散文，近年来被持续关注，成为“新时期香江书写”的重要代表，他将观察、思考、捕捉、书写升华至文化传承的层面，给香港的新时期散文创作以良好借鉴。这一点，在《人来人往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。夜半歌声的“南来”京剧老先生，是传统“南来文人”的象征，承载着厚重的文化乡愁，反复吟唱《黄鹤楼》中的“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波江上使人愁”。作者刻意点明歌者的身份，使之与作为“新南来者”的“我”形成镜像。两者间有显著的重合，都是离开原乡，在这座城市中寻找情感的落点，但差异同样分明。老先生的乡愁是指向过去的，怀念亡妻、怀念故土；而“我”的乡愁则指向未来，是对一种归属感的“探究”与“希冀”。文本中最具深意的细节，是“我”在楼上模仿老先生的唱腔，在“别时圆”三个字上，“将调子转了又转，像是探究，像是寻找，又像是希冀”。这一段描写，完全可以视为新一代“南来作家”对上一代的文化回应。老先生的歌声是“愁”，是对“此事古难全”的哀叹；而“我”的模仿是试图在理解前辈之后，为当下的自我寻找新的旋律。“他能听到吗？”这既是问老先生，也是在问这座城市。最终老先生离去，只留下唱片，“我”成了“最富有的人”，因为传承到那份文化自觉与艺术精神，由此完成了从个人经历到集体记忆的跨越，身份探寻的主题也从一个人的困惑升华为一代人对文化根脉的追寻。

《人来人往》以“人来人往”的月台开篇，为我们提供解读城市的视角；以两次“失语”的遭遇刻画身份融入的困境；以语言的转向展现文化接纳的诚意；最后以“南来”前辈的相遇为这种探寻找到了历史的坐标。赵阳的书写不同于传统“南来”叙事中的漂泊与感伤，而是在“人来人往”的现代都市景观中，透过细腻的观察与真诚的对话，积极寻求“落地生根”的可能。他的文字最终指向了一种对“活着意义”的确认，在无尽的流动与变迁中，通过每一次驻足、每一次关心、每一次书写，将自己微小的生命编织进这座城市宏大而复杂的历史经纬之中。

（作者系香港青岛中学中国文学科主任）

香江书写中的文化寻根

□陈佩琴



《江苏当代诗歌论纲》，陈义海著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25年12月

百年新诗发展至今，宏观通史的梳理与重要诗人的阐释已积累了丰硕成果，但省域尺度的系统诗歌史研究仍属相对薄弱的领域。谈及江南诗歌，公众与学界常止步于“温婉诗性”的笼统印象，鲜少深入地域肌理做精细化的学理提炼与生态普查。大量扎根地方的民间写作者、县城诗人群体，往往被宏大的文学史叙事所遮蔽。在此背景下，陈义海历时五年完成的《江苏当代诗歌论纲》，作为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结题成果，以逾60万字的体量、覆盖600余位诗人的视野，完成了对江苏当代诗歌的全景式扫描。全书以“总一分一个体”的三层结构搭建起史论框架，兼具诗的审美敏感与史的严谨厚重，既是区域诗歌研究的厚重实绩，也为当代诗歌的在地化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学术范式。

该著上篇以“江苏新诗的独特气质”为核心，相当于整部著作的综论，跳出了大众对江苏诗歌“婉约柔美”的单一刻板印象，

《游牧者笔记》：

一幅多彩的中国北方生态画卷

□丛龙瑞

内蒙古横跨西北、华北、东北三大区域，是我国荒漠化防治核心主战场、“三北”工程攻坚战核心承载区，承担全国超六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，是筑牢祖国北疆生态防线的关键战略支点，在国家生态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。近年来，内蒙古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区发展的首要战略任务，全方位、全地域、全过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各族群众同心守护祖国北疆绿色风景线。

内蒙古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，内蒙古作家历来具有深耕生态文学的创作传统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一大批作家胸怀“国之大者”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把生态作为重要书写内容，以新思路、新视角和新表达担负起书写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重要责任，推出一系列聚焦生态主题的优秀文学作品，开创了内蒙古生态文学创作的崭新局面。

其中，来自内蒙古科尔沁沙地的作家郭雪波就是其中之一。他长期专注于生态文学创作，通过一系列文学作品发出守护生态的呼声，体现了内蒙古作家的敏锐洞察和责任担当。散文集《游牧者笔记》是他多年深入基层一线、行走荒野大漠、观察体认各地生态变化、认真描写感人故事的文学记录，也是一部思想深刻、情感真挚、文风扎实的生态散文佳作。

该书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篇，内容都是作者多年实地采访收集的真实见闻和所思所想。上篇主要记录书写阿娜巴尔荒漠野驼、疏勒河生态兴趣，以及荒漠珍稀物种保护、水域生态修复的真实历程，以及保护区工作人员默默坚守、保护野生动物的感人故事。中篇以祁连山草原、乌兰察布山岗、北方大地山河、琼德勒峡谷等地为书写对象，描绘草原、峡谷、河流、胡杨、火山等自然风貌，讲述了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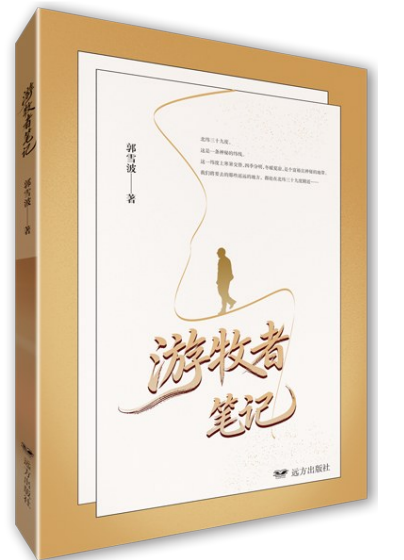
同地域的生态变化和人文故事，展现人与自然相伴相生的关系。下篇回到作者熟悉的故乡科尔沁沙地，全面记录沙地治理、生态修复、植树治沙的生动实践，书写普通牧民、基层干部等不同群体并肩作战的群像，记录沙地从沙化退化走向“绿进沙退”的治理全过程，呈现了“三北”工程、荒漠化防治的基层生动实践。三个章节内容各有侧重，篇幅有长有短，讲述有详有略，却浑然一体、相互呼应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多彩的中国北方生态画卷。

该书通过书写北方生态变迁，讴歌礼赞治沙护绿的生动实践，追溯游牧文明的生存智慧，挖掘“天人合一”的历史文化价值，通过书写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拼搏奋斗，展现了内蒙古各族儿女身上的“蒙古马精神”。作品叙述视角独特，以第一人称实地行走为主线，带给读者强烈的亲历感，增

强了作品的感染力；语言质朴简洁，没有过多装饰渲染，善用北方动植物独有的生态意象，巧妙融入游牧文化符号，形成辨识度较高的风格。可以说，《游牧者笔记》将纪实叙述、感性抒情、哲理思考融为一体，于行走书写中寄寓生态思考，实现了思想深刻、真情流露和艺术审美的有效统一，为当代生态文学创作贡献了一部佳作。

内蒙古是生态文学创作的一座富矿，广大作家要有投身生态文学创作的行动自觉，真正走进生态保护一线。生态文学创作不是蜻蜓点水式的写作，而是要真正做到身入心至，以生态为载体，写出人与生态的深层关系、反思生态失衡带来的警示，最终唤醒全人类保护生态的意识；要把好故事与人文思考有机结合，写出大地的温度、生命的气度和文明的厚度。

（作者系内蒙古作协秘书长）



《游牧者笔记》，郭雪波著，远方出版社，2025年12月